

上海市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研究

周海旺

【提要】 90年代以来,上海本地人和外地人结婚的现象越来越多。在两地婚姻中,外地一方大多来自农村,并以女性居多,实质上是外来妹的一种跨区域的社会流动。对外来媳妇来说,困扰她们的问题很多,但户口是最根本的问题,许多问题都是由户口问题派生出来的。本文对如何解决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问题进行了探讨。

【作者】 周海旺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两地婚姻的增长及其内在原因

(一)“两地婚姻”的大规模增长

所谓“两地婚姻”是指婚姻当事人双方来自不同的省市,在本文中特指一方为上海市,另一方为外省市。因为受现有的户籍仍管理制度的约束,即使双方结了婚并在一个地方共同生活,但他们的户口仍不能迁到一起。

上海市两地婚姻的大量增加始于90年代初。据上海市民政局的历年婚姻登记资料,1991年两地婚姻对数为5 112对,占当年登记结婚总对数的5.4%;到1995年,两地婚姻对数为8 748对,比重超过了10%;2000年两地婚姻对数超过了19 000对,比重为21.3%,也就是每5对登记结婚的对象中,就有1对涉及到两地婚姻(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到,近10年来两地婚姻的比重在逐年上升。

两地婚姻中以本地男性娶外地女性为主。1991~1995年上海市的两地婚姻中,外地一方为女性的占91.6%,并且两地婚姻中女性的比重有增加的趋势,因为外来男性同上海女性结婚后,尽管本人的户口不能解决,但他们的上海妻子生育的孩子是上海户口,所以说外来婚姻带来的户口等问题主要涉及到外来女性及其所生育的子女。

(二)两地婚姻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分析

1. 外来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的结果

有关的统计资料显示,两地婚姻人口的外地一方大多数来自农村,这与城市外来人口的户口结构是非常一致的。例如1993年上海市的流入人口中82.5%为农业户口,1991~1995年的两地婚姻中外地一方也有85.5%是农业户口,说明通婚潮与民工潮密切相关。

上海市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大约开始于80年代中后期,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

表1 1991~2000年上海市两地婚姻增长情况

年份	登记结婚对数	两地婚姻对数	比重(%)
1991	94 617	5 112	5.4
1992	93 867	6 336	6.8
1993	83 210	7 254	8.7
1994	85 572	8 380	9.8
1995	81 245	8 748	10.8
1996	86 622	12 253	14.1
1997	85 003	14 295	16.8
1998	75 816	13 988	18.45
1999	89 913	17 916	19.92
2000*	90 703	19 000	21.3

注:*为2000年1~11月实际数加上1999年12月的数据,估计为2000年全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上海市民政局相应各年婚姻登记资料。

的外来劳动力,使得外来人口急剧增加,1993年已经达到281万人^①,1997年276万人^②,比1993年略有回落,2000年的调查显示,流入人口总规模又有所增长,为340万人左右^③。正是由于流动人口的大量进入,为上海市民提供了与外来人口接触、沟通的机会,为两地婚姻的大量增加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历次的流动人口调查资料表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居时间有不断延长的趋势,他们长期在上海生活和工作,慢慢适应和接受了城市文明,从观念到行为模式已经逐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中,市民阶层也逐步增加了对他们的社会认同,从而使两地婚姻逐步成为现实。外来女性主要从事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同上海人接触的机会较多,容易融入城市社会。她们当中有近1/3未婚,而且年轻漂亮,肯吃苦,有许多上海女性所不具备的优点。

2. 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婚姻观念转变的结果

80年代以前,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流动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不要说跨城乡通婚,就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打工也是不可能的。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大变革正在逐步填平城乡之间的鸿沟。进入90年代以来,上海市的社会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快速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上海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改变;另一方面,也使人们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有大量的劳动力下岗失业,一些贫民阶层的人在上海市选择如意配偶的机会越来越少,大量外来人口的到来,大大增加了这些人选择婚姻对象的机会。他们开始充分利用自己作为上海人的优势,从外来人口中寻找如意对象。虽然上海人对外来人口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双方接触交流的增多,都在互相改变着自己的看法和行为方式,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东西越来越多,许多市民承认和接受了民工在城市的合理存在。通婚潮的出现和发展正是城乡双方相互接受的深度和广度上的重要突破,标志着城市社会对农村正由经济开放逐步走向社会开放、家庭开放。尽管这种开放还仅仅是个开始,但对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保持城市社会系统的活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城乡差别所产生的城乡婚姻吸引力作用的结果

中国长期执行的城乡分隔的户口管理政策,以及为了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长期牺牲农民利益的做法,人为地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也许是合理的,但从社会道德方面来讲是非常不合理的,这是几千年的封建世袭制的延续。城乡之间的差别越大,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就越大,在现实条件下,许多外来人口改变农民身份的一条较为便捷的方式就是与市民通婚。因为通婚后,即使当时不能解决户口问题,将来总会解决,并且也为下一代脱离农门奠定了基础。

由于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差距,文化上有显著的差别,城乡通婚自然要从两种社会相互接近的边缘群体开始。这样的边缘群体在城市处于社会的较低阶层,而在农村则处于较高阶层,因此,目前的两地婚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边缘婚姻。另外,城乡通婚中的性别结构和婚龄差别也是城乡差别的一种体现。在男方为城市人、女方为外地人的婚姻中,男方比女方的年龄明显偏大,“老夫少妻”屡见不鲜。城市中的男方往往是低收入人群,许多人甚至没有固定的职业,有的还是残疾人。相反,外地的女方大多年轻、有文化、精明能干。显然城市户口充当了婚姻交换的重要筹码,使城市一方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在年龄、体貌、收入、文化程度等方面的不足。假如城乡户口之间没有巨大差别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婚姻中的落差现象。

4. 相关政策变革的结果

① 1993年上海市公安局组织的上海市第五次流动人口调查结果。

② 1997年上海市公安局组织的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调查结果。

③ 2000年上海市人口普查办结合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进行的首次上海市流动人口普查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中国对户口管理制度逐步进行了一些调整,如1984年开始允许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就业,使就业和户口实现了分离;1985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替代了户口簿的部分作用;进入90年代以后,一些地方通过“卖户口”的形式,在收取了一定的费用后,可以把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部分城市还设立了与投资和买房相关的“蓝印户口”制度;1998年以来,国家还出台了婴儿户口随父随母自愿政策、解决两地分居政策、老年人投靠政策、特殊人才及其配偶的迁移政策等。这些政策已有一部分得到实施。上海市从1998年开始,允许与外来女性结婚的家庭生育的孩子在入学前申报上海市户口,这项政策对这类家庭无疑是个喜讯。

二、上海市外来媳妇的基本情况

两地婚姻的主要形式是外来妹与上海市男性的结合,涉及问题最多的也是这类,因而本文将着重分析这类婚姻的基本情况以及外来媳妇在上海市的生育和就业等方面的状况。

(一) 年龄构成

在上海市男性娶外地女性的两地婚姻中,男方的年龄跨度很大,而女方则表现出明显的相对集中状态。据1996年上海市民政局与计生委进行的全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1~1995年间与外地女性结婚的上海市男性的峰值年龄在25~34岁之间,而且35岁及以上的占28.4%,而女方的峰值年龄集中在25~29岁,35岁及以上的仅占2.5%(见表2)。此类婚姻中上海市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31.9岁,外地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6.74岁,男方比女方平均大5.17岁,远大于双方都是上海市户口的婚姻对象的婚龄差(约2~3岁)。

表2 男方为上海市户口、女方为外省市户口的两地婚姻者的年龄构成

	20岁以下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岁及以上	合计
女方样本数	3	1 057	1 770	384	51	23	8	2	3 298
百分比	0.1	32.0	53.7	11.6	1.5	0.7	0.3	0.1	100
男方样本数	2	246	1 076	1 039	705	181	30	19	3 298
百分比	0.1	7.5	32.6	31.5	21.4	5.5	0.9	0.5	100

资料来源:1996年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市计生委联合进行的两地婚姻状况调查。

(二) 文化程度构成

上海市男性娶外地女性的婚姻中,男性平均文化程度显著低于城市中可能参与婚姻的上海市未婚人口的平均文化水平,这些男性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只占29.3%,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年,而上海市未婚男性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54.5%,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外地女性的平均文化程度却略高于流入城市的未婚人群的平均水平,这类女性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4.7%,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9年;而流入城市的未婚女性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只占9.7%,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年(丁金宏等,1999)。1997年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调查还发现,流入人口中的女性,文化程度越高,同上海人结婚的比例越大,从小学、初中、中专或高中到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外来女性,有上海配偶的比例依次为3.78%、4.22%、6.05%和7.79%。

(三) 来源地构成

1997年的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调查也发现,与上海男青年结婚的外来妹的来源省份前五位是江苏、安徽、浙江、四川和江西省,共占77.4%;最多的是江苏省,占1/3以上。

(四) 居住地分布

上海市的两地婚姻以城乡结合部为主,1991~1995年间上海市登记的两地婚姻中,大约2/3居住在城郊结合部和近郊区县,这一区域常住人口只占全市的43.3%;其次是中心市区,占总数的1/4。在90年代初期,上海的两地婚姻在市内的分布形成了围绕中心市区的“脊环”结构,1997年,

在闵行区登记的婚姻中两地婚姻的比重高达 26.7%，普陀区也达到 21.6%。但是，最近两年情况有所变化，据 2000 年 11 月底上海市民政局的最新统计，两地婚姻有“中心开花”的趋势，比例最高的闸北区达到 31.4%，黄浦、卢湾等中心城区的比例也在 30% 以上。

（五）婚前户口性质

1997 年的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调查发现，虽然与上海人结婚的外省市女性的非农业户口比例远低于其上海市配偶的平均水平，但在全部外来女性人口中，非农业人口与上海市男性结婚的比例要高于其在户口类型中的比例。来自外省市的非农业户口女性，特别是来自外地城市中的女性更可能与上海市男性结婚。

三、外来媳妇的家庭困难及与城市户口的关系

（一）在上海市就业困难

外来媳妇的家庭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外来妹同上海人结婚后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只是在家里做家务。1996 年上海市计生委与民政局的调查表明，大部分外来媳妇的常住户口仍在外地，而且绝大多数婚后一直居住在上海市，常住户口与实际居住地长期分离。从就业情况看，外来媳妇在上海市找工作很难，居住在上海市的 2 714 名外地女性，没有工作的占 41.2%，外来媳妇无收入的占 48.1%。1997 年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调查显示，外来媳妇中从事经济活动的只占 44.0%，平均月收入为 525.69 元，另外 56% 没有经济收入。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较低。

（二）住房紧张

从住房情况看，目前在上海农村外来媳妇的家庭在住房方面问题不大，绝大部分是自己建造的房子。问题主要集中在一方为非农业户口的外来媳妇家庭，绝大多数在市区，住房困难户很多。1996 年的调查样本中这种类型的家庭成员大部分同上海市一方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合住，单独居住在上海市一方的私房或者单位分配的房子比例较小，而且住房面积在人均 4 平方米以下的占 35.1%。还有一部分家庭居住在租借的私房或者单位暂时提供的房子。房屋动迁中，她们因为没有上海市户口，居住条件难以得到应有的改善。

（三）经济收入较低

外来媳妇家庭的经济收入普遍较少，不但她们本人有工作的比例低，其丈夫下岗和失业的比例也远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1996 年上海市计生委与民政局的调查显示，外来媳妇的配偶没有收入的比例为 5.1%。长宁区华阳街道 1997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外来媳妇家庭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家庭月收入 500 元以下或无固定收入的占 63.4%，而同年上海城市居民的人均月消费性支出达到 564 元，比 63.4% 的外来媳妇家庭的全部收入还多。

由于外来媳妇和其丈夫的就业层次较低，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在近年的下岗浪潮中首当其冲。外来媳妇的处境比上海市下岗女工还难，她们不属上海市户口，因而得不到市再就业工程的帮助。

（四）医疗待遇差

在医疗待遇方面，两地婚姻家庭中的困难比较多，1996 年的调查样本中男方自费的比例为 26.7%，女方自费的比例为 68.0%。

（五）孩子入托、入幼、入学难

这并不是说外来媳妇的孩子不能在本地入托、入学，而是经济上要多付出一些。她们的子女因无上海市户口，在沪就读需交借读费、赞助费和多交管理费等，本来收入就低，还要增加这些支出。

（六）许多家庭的孩子在两地均无户口

目前上海市两地婚姻家庭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大部分孩子在两地都没有申报户口，1996 年调查样本中第一个孩子在两地都未申报户口的比例为 65.9%。

四、外来媳妇增多给上海市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 有利于解决上海市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家庭问题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提供的 199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的资料, 1995 年全市年龄在 30 岁以上 40 岁以下的大龄未婚青年有 20.4 万, 而且近几年还在不断增加。这 20 万大龄未婚青年中男性占 85%, 女性仅占 15%, 即使这 3 万大龄女性全部从 17 万男性中寻找对象, 也还有 14 万左右的男性找不到对象。况且这 3 万女性中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85%, 72.5% 属“白领阶层”, 因而对男方的要求相当高。而 17 万男性中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 14.7%, 只有 18.2% 从事“白领”工作, 多数人收入较低, 不少大龄男青年不但没有高学历、高收入, 就连个头也达不到“高”的标准。尽管从理论上讲他们还可以从本地 30 岁以下的女性中寻找对象, 但要真正实施起来, 难度较大。因而, 对许多男性大龄青年来说, 从外来妹中寻找生活伴侣是解决他们婚姻问题的一种明智和现实的选择。

(二) 可能会造成新的婚姻困难人群, 对本地女性的婚姻选择带来激烈的竞争

由于两地户口婚姻绝大多数是城市男性与外地女性的结合, 它在消化城市男性婚姻困难人口的同时, 也造成了城市女性非自愿独身人群的扩大。虽然, 对外开放后沿海大城市涉外婚姻有了很大的增长, 而且也是以女性移出为主要形式, 造成这些城市流失了一些年轻妇女。但是两地户口婚姻增加的外地妇女在人数上远大于涉外婚姻流失的妇女。例如, 上海市 1999 年登记的两地婚姻超过 17 916 对, 涉外婚姻只有 2 869 对。因此, 大量的两地婚姻势必造成城市婚姻市场中的女性过剩。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海市常住人口的性别比为 104.1, 但到 199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时常住人口的性别比已陡降到 99.4, 其原因除了人口老龄化使老年人口中女性的比重增加和抽样误差外, 两地婚姻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常住人口中的外来流动人口的性别比是男性多于女性, 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的增加理应使性别比上升, 实际上却发生了下降, 只能说明外来人口中在上海市停留半年以上的女性比重在增加, 而外来媳妇基本上一直在上海生活。1995 年上海市中青年人口的实际性别比显著低于按照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的应有的水平, 这极有可能是大量女性婚姻迁入的结果。与此同时, 两地婚姻使落后农村的妇女外流, 必然造成这些地区的一些男性农民陷入婚姻困境, 日积月累可能引发贫困农村的社会问题。

(三) 对城市人口控制目标构成一定的挑战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 1999 年底全市户籍人口为 1 313 万人, 常住人口为 1 500 万人左右, 上海市人口再生产类型已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现代型。1993 年开始, 全市人口自然变动进入了负增长阶段。1998 年全市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3.03%, 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8%, 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0.87。据预测, 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变, 未来几十年, 上海市人口自然变动将持续负增长。近年来上海人口的净增长全部来自机械增长, 平均每年的净迁入量为 6 万~8 万人, 抵消自然减少, 户籍人口实际净增长 3 万~4 万人。两地婚姻已经成为上海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2000 年的两地婚姻数每年已达到 1.9 万对, 这些家庭在婚后 1~2 年一般都会生育子女, 按照现行户口管理政策, 外来男性与上海市女性结婚生育的孩子可以随上海市的女方申报上海户口, 而外来媳妇生育的孩子虽然不能马上申报户口, 但在上小学以前可以申报户口, 外来媳妇本人在经历了若干年后也可以申报上海户口, 因此上海市每年的户籍人口实际净迁入量已经达到 5 万~6 万人左右, 其中两地婚姻引致的净迁入占到 30%~40% 左右。

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居住时间的延长, 城乡人口的社会交往机会在增加, 城乡通婚的频率将会进一步提高。未来户口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淡化户口连带的社会待遇, 城乡通婚的制度障碍将越来越小。比如会使城乡通婚潮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上升的势头, 对上海市的人口规模控制目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四) 其他问题

外来媳妇的婚姻中未办理婚姻登记的现象较多。从1996年的调查看,两地婚姻中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对象以夫妻名义居住在一起,其中69%的对象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这其中有的是没到年龄,开不出结婚证明;有的是不重视婚姻登记工作,法律意识淡漠;有的属于“包二奶”的情况,不可能结婚,只能是同居关系。外来媳妇中无计划生育特别是未婚生育现象也比较严重。1996年的调查表明,在1869个生育过孩子的两地婚姻家庭中,有5.1%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据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资料,1991~1995年期间全市两地婚姻中属于未婚生育的数量合计为960例,同期上海市非两地婚姻中的未婚生育数量为500例,前者比后者多近一倍。多数外地计生部门对两地婚姻中的当地女方基本上处于不管状态,少数地区在方法上也欠妥。1996年的调查数据表明,73.1%的被调查者反映当地计生部门从来不同她们联系。19.7%的被调查者反映,当地计生部门要求她们定期回去检查孕情或定期把在上海市的孕情检查证明寄回,其中定期回去检查孕情的做法不仅增加了这类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影响了女方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五、解决外来媳妇及其子女户口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及对策探讨

(一) 解决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对今后两地婚姻的可能影响

从本文中可以看出,即使不能马上解决户口,90年代以来外来女性与上海市男性结合的婚姻形式却一直呈加速上涨的态势,这种形势使一些政府管理部门担心,假如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使她们在婚后都能很快获得上海市户口的话,那么这类婚姻会不会出现“爆炸”式的增长呢?我们认为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如果放开了户口的限制,这种形式的婚姻肯定会比现在的规模还要有一定的增长,但也应该认识到两地婚姻的增长不会是无限制的。首先,城乡之间的文化、观念、习俗、受教育机会、社会道德规范、文明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不可能迅速消失,城市居民对娶“乡下人”为妻还颇有顾虑,城乡之间过高的“门槛”,使许多外来人口对在上海市的生活和工作不抱长远的打算,只是准备干几年,学些技术或挣些钱后就回去;其次,两地婚姻中存在悬殊的性别差异,在婚入人口以女性占绝大多数的条件下,随着这种婚姻的增长,城市婚龄人群的性别比例将趋于平衡,在上海市的婚姻市场中,本地女性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当婚姻市场中的女性人口超过男性人口时,外来女性同上海市男性结婚的可能性将会下降。根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上海市目前正在和将要进入婚龄阶段的15~24岁人口中,男女平均差额约为每岁4500人,即男性多于女性,考虑到城市大龄未婚男性的继续介入、再婚男性的介入、涉外婚姻中女性的迁出、外来男性婚入等因素,在目前城乡文化、观念差异状态下,城乡通婚的规模上限近期在每年2.5万对左右。

对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解决的方式也会对这类婚姻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能够在短时期内比较容易地获得上海市户口,那么,这类婚姻肯定会大幅度增加,这中间一部分是必要的真正的婚姻需要,同时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把婚姻作为获得上海市户口的“跳板”。如果户口控制得过严,使她们申领上海市户口的时间遥遥无期,在获得以前要付出很大代价,那么,对这类婚姻一定会有很大的抑制作用(如上海市80年代以前的情况)。

(二) 解决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对上海市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可能影响

根据前几年的调查,外来媳妇一般是中青年妇女,都是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如果把她们纳入上海市的户籍人口进行管理,无疑会增加上海市劳动力的供给量。尽管她们当中不少人原来就在上海市打工,但原来没有涵盖到上海市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之内,一般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是正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外的自由流动的劳动者,她们的下岗和失业问题不需要上海市解决,最低生活保障也不需要上海市承担。但如果解决了她们的户口,她们就自然被包括进城市居民的就业和福利保障体系之中。她们虽然是流动女性人口中的佼佼者,但与上海市同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

掌握的劳动技能较少,只能从事较低层次的简单劳动,而这必然与上海市原有的下岗失业人员形成在低层次的竞争,有可能加剧下岗失业现象。这些外来女性如果下岗失业了,上海市政府要承担她们的再就业培训工作,并要帮助她们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为她们办理各项社会保障基金,为她们当中的困难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这一切必然会加重上海市各级政府部门的负担。

外来媳妇绝大部分会在上海市生育子女,她们生育的孩子将陆续进入劳动年龄。因为外来媳妇的增加主要是90年代以后,所以从2005年开始,将有越来越多的这类子女进入劳动年龄。而根据我们依据“四普”资料进行的预测,2005年以后上海市户籍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后备资源不足,如果外来媳妇的子女在解决了户口后逐渐补充到上海市的年轻劳动力队伍中,对上海市的劳动力供给和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有利的因素。这些孩子在上海市出生、成长、接受教育,对他们不应该有歧视性的政策和看法。他们参加工作后,适逢上海市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时期,必将对缓解上海的人口老龄化危机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 解决外来媳妇及其子女户口对上海市未来人口控制目标的影响

上海市未来人口总量的发展变化,主要取决于生育政策、迁移政策和流动人口数量三个方面。按现行生育政策预测,2012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将达到最高峰,分别为1392万人、1592万人^①。根据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1999年提供的资料,上海市历史遗留下来的户口问题以及近年产生的新户口问题,涉及户口从外省市迁入上海市的人数约在70万~80万,包括两地婚姻家庭的子女及外省市一方配偶约有20万人,还有退休后返沪投靠其子女的知青、部分退休的支内支边职工、已在上海市办理蓝印户口的外来人员等。另外,上海市正在制订和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鼓励大学毕业生留在上海市工作,鼓励引进各类人才,这些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增加人口的迁入量。按照上海市目前的出生、死亡和迁移情况,今后户籍人口每年还将有一定数量的增长,如果不加调控或者调控不力的话,上海市到2010年以及远期的户籍人口数量分阶段控制目标将会突破。

然而,婚姻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应有的权利,控制人口虽然是大城市良性发展的需要,但在控制人口的同时,要把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满足人们的婚姻需求,保持婚姻市场的良性平衡放在首要位置。更何况,上海市合理的人口规模并不是一个不变的数字,从上海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以及它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地位来看,上海市1600万人口的远期目标显然是偏小。上海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绿地较少、公共设施不足等并不是人口规模的多少造成的,而是不合理的城市规划和布局、经济发展政策的失误、落后的技术手段、较低的人口素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等因素造成的,与人口规模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人口规模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决定性因素。从另一个方面看,假如上海市没有现在1500多万的人口规模,而是只有150万人的话,那么上海市肯定不会有今天它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

(四) 解决外来媳妇及其子女户口的方式和方法探讨

笔者认为,解决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的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继续维持现有的方式,按照婚龄的长短和她们的孩子的年龄大小逐步解决。

根据目前上海市户口迁移政策的有关精神:两地婚姻中外省市农民和上海市农民结婚,婚后外省市一方在上海市居住满6年以上的,本人和子女的户口可以迁入上海市;两地婚姻中外省市农民和上海市城镇居民结婚,婚后外省市一方在上海市居住满15年以上的,其本人可以申报上海市常住户口,子女在入学前也可申报上海市户口。

对于在农村同上海市农民结婚的外来媳妇的户口申报政策来看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对于同上海市城镇居民结婚的外来媳妇来说,15年实在太长了。据说,时间定得这么久是为了限制一些外

^①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测数。

来女性把婚姻作为进入上海的“跳板”，一旦拿到上海市户口就与比她们条件差的丈夫“分手”。

按规定，外来媳妇生育的孩子应该申报外省市户口，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主要是上海市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生活和教育水平比较高以及他们已长期在此居住），这些家庭生育孩子后普遍不愿申报外省市户口，怕一旦报了外地户口，再迁入上海市就很难了。目前市区这类家庭要求解决孩子户口的呼声极为强烈。

2. 参照目前上海市人口迁移政策，但是缩短等待申报户口的时间

比如把外来媳妇申报户口的时间缩短到婚后5年，并在申报时进行有关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考试，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获得上海市正式户口。她们生育的孩子在3岁入托前就可以申报上海市户口甚至在出生后就可以直接申报上海市户口（根据1998年国家颁布的有关政策，孩子户口可以随父也可以随母）。但是，这些外来媳妇必须遵照上海市和流出地的双重计划生育政策，在政策宽松不一时，以较严的一种为准，从严控制外来媳妇的生育行为，禁止多胎生育。

3. 政策加指标结合起来进行控制和解决

每年根据人口发展总的控制目标下达解决外来媳妇户口的规模，可以根据结婚的时间长短、文化水平、本地男性的条件、家庭中是否有需要护理的老人和残疾人等条件制订一套评分标准，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可以参加评分，公开评分结果，根据分值的高低排队，逐步加以解决。这种方法类似于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在内地生育的子女迁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办法，但条件应该放宽。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涉及到的这类子女人数太多，有167万人，而上海市较少，并且上海城市的承受能力要远远高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4. 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制订一些补充条款，解决外来媳妇的实际困难

对于外来媳妇生育的子女，在户口未报入上海市期间，在入托、入幼和入学时应和上海市其他孩子一视同仁。考虑到解决这类家庭孩子申报上海市常住户口的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可能时间比较长，即使允许提前到满6周岁可以申报，但在6周岁以前仍存在着入托、入幼问题。因此，建议市政府协调教育部门，在孩子户口未报入上海市期间，对这部分孩子的入托、入幼和入学问题采取倾斜政策，在收费等方面应与上海市其他孩子“一视同仁”。对于外来媳妇本人，在报入上海市户口之前，可以享受相当于“蓝印户口”的待遇，既有别于正式户口，又不同于一般的流动人口暂住证，要减免她们办理各项证明的费用，在就业、就医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照顾。

总之，上海市两地婚姻数量今后有不断增加的趋势。目前上海市这类家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多，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现行的户口管理及相关的政策进行调整，缩短与上海市城镇居民结婚的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申报上海市常住户口的时间。外来媳妇及其子女长期居住在上海，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管理措施和政策上应区别于一般的流动人口，可以参照管理“蓝印户口”人员的方式对她们进行管理。在外来媳妇和其子女户口未报入上海市户口之前，要给予适当的照顾。

参考文献：

1. 张声华等：《上海流动人口的现状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王午鼎等：《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3. 丁金宏等：《论城市两地户口婚姻的增长、特征及其社会政策寓意》，《人口研究》，1999年第5期。
4. 上海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上海公民与外省市公民婚姻生育情况调查研究报告》，1996年。
5.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年鉴》，2000年。
6.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探索建立以现居住地为主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新体制》，2000年。

（本文责任编辑：朱 萍）